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吉狄马加

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被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丰硕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宏大、广博、丰富、系统、完整的整体，毫无疑问，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实现转化的历史时期进行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文艺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根据新时代的新问题、新经验、新现象，做出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概括，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要文艺思想，不仅完整勾勒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而且深刻指明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方向 and 前进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

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籍中，人民一般泛指人，如《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也指平民、庶民、百姓，如《周礼·官记·大司徒》：“掌建邦之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在古希腊、古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中也使用过人民的概念，但它是指数奴隶和自由民，不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往往与公民、国民等词混用，泛指社会的全体成员。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民这一概念才有了科学的和确定的含义。人民性最早是马克思于1842年4月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时提出来的，他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中国文学中的人民和人民性概念从五四时期才从俄国传入中国。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都使用过“人民性”。在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内涵是“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学是以这一阶层的人的生活为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为对象，即“人民性”是相对于“贵族性”的。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从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真正处境和卫护人民利益的观点，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1944年所作的演讲《为人民服务》，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毛泽东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次强调：“紧紧地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从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要求来看，应当说这是对革命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是对广大革命工作者的要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最早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到文艺领域中，成为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1979年，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最早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胡锦涛同志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上重申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在以往的理解中，“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或群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和爱恨的表述，继承并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群体概念的超越，即我们既重视作为群体的“人民”，也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为人民”写作与作家的艺术家的主体性是并不矛盾的，是辩证统一的。

如果历史地看，“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是一个崭新的提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作家艺术家主体性与创造力的充分尊重，这也是我们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文艺提出了更高要求，他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对于作家来说，“灵魂的工程师”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也是一种精神与艺术上的事业，这与作家的主体性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集中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核来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开拓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空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了“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者要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这把文艺作品优劣同对人民态度关联起来考察，张扬了唯物史观，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不仅在文艺理论上是极大的创造，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长河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们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也极大增添了文艺理论的“中国的”元素和精神内涵。这不仅出色解决了文艺理论上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而且为未来的文艺理论发展铺设了一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石。这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根本价值取向。



诗词金句的魅力

高 昌

中华传统诗词，金句颇多。在政治活动、外交联系、人际交往、民族沟通等等场合，如果恰当地引用一些诗词金句，就会产生画龙点睛、豁然开朗的效果，特别容易出彩。

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请求秦国发兵帮助楚国，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秦国答应后，两国“签署”的“军事协作协议”，就是以《诗经》中《无衣》来表达的。秦哀公亲自唱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就比直白地喊几句“联合作战，一起抗敌”的口号，更能激动人心。再比如，晋国的范宣子想请鲁国帮助晋国讨伐郑国，为了试探郑国的态度，在鲁国吟诵了一段《诗经》中的《采芣苢》：“采芣苢，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范宣子借用这段诗歌，劝告鲁国要抓住兵机，迅速行动。这比一般公文中的外交辞令，就更加委婉超脱，机敏圆转。还是晋国的范宣子，有一次他在诸侯盟会上指责姜戎的国君戎子驹支私通敌国，戎子驹支当场吟诵了《诗经》中的《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这就比一般的自辩白更加晓畅清晰，收到普通公文语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

外国人在外交场合引用诗词金句的例证也不少。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产生了很好的外交效应，成为外交佳话。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北京的欢迎晚宴祝酒词中说：“在许多世纪之前，一位名叫王勃的中国哲学家和诗人写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北京的欢迎晚宴中提到乘船过三峡的经历时说：“我们想起了三国的故事，几乎听到了诗人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描述。”……这些诗词金句，在外交往来中给引用者加分不少。

习近平同志在文章、讲话中也曾多次引用古代诗词，赋予了古典名句焕然一新时代魅力。比如2017年10月25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正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习近平同志这里引用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出自元代诗人王冕的诗歌《墨梅》。这两句诗通过墨梅不夸耀颜色、只播撒清芬的特点，表达了对品格的坚持、对初心的执着、对信念的自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同志在记者会引用这两句诗，就非常贴切和精彩。

根据时机和场合的不同，我认为引用诗词金句，有以下八点需要特别注意：

1. 贵在平易简洁。诗词要说服力和表现力服务，引用诗词是为了更加生动、鲜明地传达出作者的主旨，要求简约得法，适可而止，把握分寸，不能搞成堆砌辞藻的小杂烩和炫耀才学的大风车。衡量的标准并非空泛的华丽，而是要高度概括地表达感情，并适合特定的语言环境。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都是劝人抓紧青少年时期加强学习的意思，引用一处即可，

没必要一一罗列。

2. 贵在精准确切。要吃透精神，善于领会，有的放矢。要注意对象，求真务实，不溢美，不虚饰，还要弄懂诗词的本意和引申义，要搞清楚具体语境和情境。用的合适就焕发然光彩，用的不合适就会闹笑话，甚至适得其反。比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用来表示信心，而“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表现的则是恒心。

3. 贵在妙趣横生。在公众场合引用诗词金句，看重的还是实用价值和文字亲和力，是为了使思想更加深邃和形象，而不是为了板着脸面孔教训人。比如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全会上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来比喻腐败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来形容昏庸腐败的危害，就有着尖锐深刻的思想锋芒，同时又风趣警警，引人入胜。

4. 贵在质朴晓畅。引用诗词金句，要避免出现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现象，不宜选择过分生僻和晦涩的诗词，也不宜选择容易产生争议、歧义和曲解的诗词。比如在主题为“走向未来”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场合，引用“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的诗句，就贴切传神，明白准确。而倘若引用同一首诗中的“波定远天出，沙平远岸穷”，就可能产生误会性的解读。

5. 贵在举一反三。引用诗词不一定是原封不动照搬。有时候独具匠心地改动几个字，或故意反其意而用之，也会产生出奇制胜和出人意料的作用。比如习近平同志跟青年代表座谈时展望未来，引用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和“一代更比一代强”。“长

江后浪推前浪”出自宋代刘斧《青琐高议》：“我闻古人之诗曰：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因为后面一句“浮世新人换旧人”比较生僻，改为现代口语“一代更比一代强”，就显得晓畅自然，洗练清新。

6. 贵在和谐圆转。文风要一致，不能生硬插入，杂乱无章。在适合口语化风格的场合，就要引用浅显通俗的作品，或者是耳熟能详的名篇。比如“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在书面性比较强的情境下，就要引用典雅精典的作品，比如“子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7. 贵在独出机杼。引用诗词也需要有创新意识。在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新颖别致，新人耳目，尤其注意避免类型化的废话和模板式的套话。比如说到不服老就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说到人才问题就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些诗句虽然很贴切，但是引用的人多了，就容易产生似曾相识、陈陈相因的负面效果。

8. 贵在掷地有声。引用诗词要选择时机，用在关键场合、关键段落。像爆竹一样，抛出来就要有响儿。比如同样一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用在讲话的开头还是中间位置，抑或是结尾段落，都要仔细斟酌。位置不同，表达效果也会有明显差异。

学识可以使我们“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诗词金句所带来的美学滋养，使我们更好地陶冶性情，品味生活，以怡情，以美启智，以美塑魂，以美育人，从而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2018年是农历戊戌年，生肖为狗。戊戌年在《六十甲子纳音歌》中“戊戌己亥平地木”，是木狗年。十二生肖的收录原则和排列顺序的说法也多种多样，最普遍的说法是十二生肖的选用与排列是根据每天动物活动规律的时辰和趾数的奇偶来安排的。狗要守夜，因此排在“戌(19时至21时)”时，又因其趾为“五”，是奇数，因此顺居在第十一位。十二生肖记载了我们祖先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体现了天人感应、众生平等、物有循环的理念，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时间文化多姿多彩。十二生肖每尊都有自己的人生特色，狗的生肖歌为：

戌狗通灵宜为友，
一心一意恪职守，
天狗敢吞日和月，
俯首甘为人助手。

戌狗通灵宜为友。狗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忠实伴侣和助手，它的最大特点是能与主人“通灵”。我国古代流传着许多关于“义犬”的传说，东晋陶潜《搜神后记》讲了一个义犬救主的故事：广陵人杨某家养一只爱犬，一天从早到晚不离其左右。有一天夜晚杨某外出，不慎失足掉入一口枯井中，自己无力爬出。家犬见主人落井，守在井边通宵吠叫。天明时有人路过，见此狗对着井口叫唤不止，发现了落井的杨某。杨某说：“你帮我出井，当有厚报。”那人说：“把这只狗送给我，我就救你出井。”杨某说：“这条狗曾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给你。除此，你要什么都可以。”那人说：“你不幸得狗，我就不管你的事。”这时，狗探头向井，示意可以答应他。杨某领会其意，答应了过路人的条件。那人将杨某救出井，随后系了狗，牵着走了。第五天，那条狗趁夜逃离，回到了主人身边，这样一条通人性的狗令人见人爱。人宠爱狗，狗对主人也有感情，不但有口头传说，也有实验论证。2014年4月29日《参考消息》刊文：“研究发现狗确实会爱主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家养的动物与主人亲近时体内会释放出“爱的荷尔蒙”后叶催产素，说明狗爱主人并非为了吃的，因为狗确实有对人产生爱的能力。

一心一意恪职守。关于生肖在地支上的排位，蕴含着中华文化人与动物关系方面的丰富内容。狗是“义犬”，有从一而终的美德。人们对它有“狗不嫌家贫”的评语，因此对它位居生肖“十一”，产生了一心一意的联想。吴慧颖在《中国数文化》一书的序中说“数——国人的第二语言”，中华民族这种对数字的特殊情感自然会反映到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上来，以强调每个生肖的个性。每年农历元月初二为“犬日”，有敬狗习俗。“十一”有在“十全十美”之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含义。长期以来，狗被认为是恪守职责、尽心尽力的典范。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十有《义犬冢》的故事：三国吴国孙权当政时，有襄阳人李信纯家养爱犬名黑龙，有一天李信纯携犬赴宴，醉卧于郊外。正遇太守烧荒围猎，狗见火起，危及主人，可是狂吠和拉拽均不能使李信纯醒酒，于是跑到50多步远的水塘中湿身，将主人身边的草火压灭，累毙于主人身边。此景被路过的太守看见，说：“犬之报恩基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重葬此狗，并修了高十余丈的义犬墓。类似的故事在满族中也存在，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幼年在躲避明朝辽东总兵李或梁的追杀中，就是他的爱犬小黄狗以同样方法救了草中火海中的主人，劳累而亡。满族人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的习俗由此而来。

天狗敢吞日和月。什么叫天狗？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这样记载：“有赤犬，名曰天犬。”天狗又称戌之神，作为民间信仰神，人们赋予它可吞日月的神力。这种联想来源有三个：第一，图腾崇拜。《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了一个畜狗盘瓠因杀敌有功，被高辛帝召为驸马，与公主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十二人，成为高辛氏祖先的传说。第二，来源于对西王母的崇拜。《山海经》中神力广大的西王母“其状如人，狗尾”，具有狗的特征。第三，传说天狗是风神。《山海经·北山经》有关狗为风神的传说。唐朝杜甫写过一篇《天狗赋》，称其为“夫何天狗嶙峋兮气独神秀”。从天文学的角度看，月日的产生与狗没有丝毫关系，人们把世间猎犬狩猎的情景，与天上的月(兔)食进行联想，于是我们人类的祖先演绎了丰富多彩的狗食月的精彩故事。另外，“犬”与“权”谐音，因此历史上曾有以小狗玩具为节日吉祥物送上司习俗，寓意“犬权在握”，以讨欢心。

俯首甘为人助手。在我国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有这样相似的记载：神创造了人之后，创造的第一个动物就是狗。神告诉狗，你将来的人主人是。古代，狗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狩猎、牧羊。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狗忠实为人服务的故事，为了保卫主人家院，有多少家犬与恶狼经过搏斗倒在狼的利齿之下，为主人献出生命。又有多少狗为主人身负重伤，皮开肉绽血迹斑斑，骨折筋断，也要把受伤的野兽咬到主人面前，而得到的只是一根骨头、一碗剩饭。随着社会的发展，狗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种类也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庞大家族，约有300多种。2017年7月24日《北京日报》介绍了导盲犬驯导员刘扬的故事，他驯养的一条两岁的名叫来福的惠比特大，能分辨铃铛、电话、敲门声、孩子哭声、手机与汽笛等声响，然后通过接触主人身体的不同部位，使主人及时处理有关情况。有一次，灶台的燃气被锅中溢出的沸水熄灭，听障的主人未觉察到此险情，关门要走。由刘扬训练的导盲犬欢欢，咬住主人的裤角不让走，成功地及时提醒听障的主人把被熄灭的灶台的开关关上，从而避免了一次因燃气泄漏而造成的安全事故。

生肖纪年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它把本来枯燥的年份数码进行了生动的归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十二生肖具有闻而不忘，视而可记的文化形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历史上生肖为狗的文化名人很多，如孔丘、玄奘、海瑞等。今年适逢“戊戌变法”120周年，那年出生的名人有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田汉、老舍和李苦禅等。由于狗与人的关系密切，所以留下了许多与狗有关的地名，以北京为例，历史上城区有“狗尾巴胡同(高义伯)”“打狗巷(打鼓巷)”“狗馮胡同(高卧胡同)”，房山区有黑狗台、门头沟有狗牙山、平谷有狗背岭等。

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对通俗文化的认同是重要形式之一。十二生肖是最通俗的文化符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宣传十二生肖，将使我们的节日文化更加生动有趣。



赵书

观点摘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文化创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文化创造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围绕民族文化的延续而不断调整自己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从而把二者之间的冲突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把各自有利于民族文化延续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最大效能地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文化创

造活动，绝非我国文化战略的一时之计，而是我国今后文化建设和发展中长期有效的一种文化模式。

(张兆林、东华娜：《基于文化自觉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文化创造》，原载于《美术观察》2017年第6期)

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

走具有开创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

具象化传播之路，是电视节目创新性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互促共赢的重要可行性途径。一方面，这可以为电视节目在新的技术条件、社会语境下的多元化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实现有效的传播效果，巩固并扩大受众群体的范围，从而切实发挥属于电视媒体的媒介议题设置功能。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有效地唤醒广大受众内心的民族归属性的文化

意识，实现民族文化基因的有效传承、巩固，进而向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增强电视媒体传播竞争实力、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有益性探索。

(王源：《中华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原创性电视节目发展的新路径》，原载于《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